

A comparison based on the image of "sword": On the Yuan Dynasty zaju and the Ming Dynasty edition of "Wang Can Denglou"

Teng Shi Ying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iterary connotations of the "sword" as portrayed by literati in Tang poetry and explores how the Yuan dynasty zaju 杂剧 Wang Can Denglou 王粲登楼 incorporates the sword imagery into its dramatic creation. It further investigates how the play reflects Wang Can's perspective on both literary and martial virtu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sword imagery in the zaju largely derives from the historical anecdote of Feng Xuan 冯谗 plucking his sword. Wang Can frequently compares himself to figures like Feng Xuan and Han Xin 韩信, albeit with different intentions, all serving Zheng Guangzu's 郑光祖 purpose of shaping Wang Can's ambitions as a military general. Historically, Wang Can was skilled in both literature and martial arts. The Yuan edition of the play aligns more closely with the historical image of Wang Can, filling the gap regarding his martial persona. The Gu Mingjia edition 《古名家杂剧》, a Ming dynasty revision, retains most of the plot from the Yuan edition but alters, supplements, or omits certain sword-related elements, thereby influencing Zheng Guangzu's portrayal of Wang Can. A comparison of the two versions reveals that the Yuan edition presents a richer depiction of Wang Can, with more intricate literary imagery. This contrast highlights how the Yuan edition's dramatists portrayed Wang Can's true character from their artistic perspective. As for the Ming period, the sword no longer served a military function or acted as a symbol of ambition; hence, the omission of "sword" in the Ming edition is understandable. This also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ext's lack of artistic expressiveness.

Keywords

Sword, Yuan Dynasty zaju, Gu Mingjia edition, Wang Can Denglou, Image

从“剑”意象出发的对照： 谈元刊本与明本《王粲登楼》

邓诗樱*

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内容摘要：

本文从唐诗为对象，观察文人赋予“剑”的文学内涵为何，借此延伸元杂剧《王粲登楼》如何融入“剑”意象于杂剧创作中，其又如何展现王粲的“文武”观点。研究结果显示，杂剧的“剑”多从“冯谖弹铗”的典故而来。王粲频频自比冯谖、韩信，虽用意各不同，却都是郑光祖为铸造王粲武将志业之用心。史上王粲能文也能武，元刊本的设计较符合历史王粲的形象，也增补王粲在历史中武人形象这一空缺。《古名家杂剧本》为明人改本，其对“元刊本”剧情并无太大改动，但于“剑”的呈现有所删减、增补、更动，进而影响郑光祖塑造出来的王粲形象。经过两本对比，“元刊本”王粲形象较为丰富，文学意象设计巧妙。由此即见元刊本《王粲登楼》曲家视角的王粲其真实面目；至于明代，剑已不再承担军事功能或象征抱负的载体，因此明本对“剑”的删削有其合理性，这也为理解文本艺术性的缺失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剑，元刊本，古名家杂剧，王粲登楼，王粲形象

* 邓诗樱，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一、前言

元杂剧《醉思乡王粲登楼》为元人郑光祖（生年约 1250-约 1323）所作。¹现存有“元刊本”，后有明人赵琦美（1563-1624）“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之《古名家杂剧本》（以下简称《古名家本》）、臧懋循（1550-1620）《元曲选》本、孟称舜（1594-1684）《酌江集》本；明本在“元刊本”的基础上对杂剧曲辞、情节等进行改动。虽“元刊本”只保留曲辞，除正末、正旦的简单宾白外，其他角色的宾白一概不存，以致单靠阅读“元刊杂剧”，难以确认故事情节的发展状况。可是，若要了解元代杂剧原来风貌，应当重视元刊本。²

针对“杂剧王粲”形象，学界多按明人整理的本子进行研究的，如贾锡信〈试论“王粲登楼”〉、叶杰英〈困顿与凄怨——杂剧“王粲登楼”之王粲形象解析〉，皆以臧懋循的《元曲选》本进行王粲形象讨论。³实际上，若将元、明代本子两相对照，会发现元、明王粲的形象差异颇大，尤其“剑”在两本的呈现不同，影响杂剧“王粲”人物形象跟着有异。在此前提下，本文关注的是，贴近元代面目的元刊本如何发挥“剑”意象？“剑”的出现如何塑造王粲的人物形象，其如何联系王粲的文武志业？另外，明人如何改动元本“剑”的设定？此改动给王粲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拟从唐诗中“剑”的意象谈起，勘察“剑”意象有着什么样的内涵，以论述元刊本的“剑”意象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再从“剑”意象的发挥论述王粲的文武志业以及“王粲”人物形象的塑造。最后尝试对比明本，勾勒明人对“剑”之改动如何影响“王粲形象”，期望在对比之间得以突显出元本“王粲”的人格内涵。

二、“剑”的文学意象概说

¹ 陆林将郑光祖的生年定于 1250-1263 年，卒年定于 1320-1323 年之间。见陆林：〈“郑”是郑廷玉说难以成立——兼议郑光祖生年〉，《元代戏剧学研究》，第 75-79 页。亦见于汪诗珮：〈世变、文人、隐喻——元杂剧《王粲登楼》的视界〉，《汉学研究》28 卷 1 期，2010 年 3 月，第 135 页。

² 郑骞（1906-1991）：〈从《元曲选》说到《元刊杂剧三十种》〉，见于《景午丛编》（上编），台北：中华书局，1972 年 01 月，第 406 页。

³ 贾锡信于注释部分，著名杂剧《王粲登楼》引文来自《元曲选》本；叶杰英虽无表明版本，观其引文“【煞尾】他年不做文章伯，异日能为将相材”一句，除《元曲选》本外，元刊本、古名家本皆为“他年不作文章客，异日能为将相材。”详见贾锡信：〈试论“王粲登楼”〉，《河北大学学报》第 2 期，1984 年，第 80-86 页；叶杰英：〈困顿与凄怨——杂剧《王粲登楼》之王粲形象解析〉，《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 24 卷，第 5 期，2008 年 10 月，第 91-93 页。

剑属兵器的一种，在发明铸造之初已隐然蕴含某些文化性质，包括尊贵性、权威性、神异性及宗教性质。⁴这种种文化性质杂糅于“剑”一身，以致后代文人对剑文化特别着迷，因而时常现身于文学作品中。自先秦始起，文学作品已出现“剑”之踪影，至魏晋时期，诗歌中的“剑”意象内涵相较前期有所转变，且出现的次数增多。⁵至唐代，经检索，仅是《全唐诗》出现“剑”的次数就高达千次以上，⁶达致颠峰。剑之文学内涵于此时基本也已奠定下来。《全宋诗》有 285 笔、⁷《全宋词》有 172 笔，⁸其数量显然比唐代少，但宋代“剑”之意象颇有承袭唐代“剑”之意涵，故本节主要以唐诗作为观察对象，梳理“剑”在唐诗中发挥的内在特点。⁹

经过学界的分析，唐诗“剑”之意象具四种内涵：¹⁰

第一、借剑言志、作为渴望为朝廷建功立业的象征，如张祜“按剑从沙漠，歌谣满帝京。寄言天下将，须立武功名。”¹¹崔颢“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

⁴ 详见蔡长娣：《唐诗中“剑”的意象研究》，第三章：剑的文化性质，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硕士论文，林保淳教授指导，2021年1月，第45-74页。

⁵ 经刘爽统计，“剑”在《楚辞》中共出现七次，有“祭祀、送子、武器、配饰四种内涵”。至于魏晋，剑的意象与“豪侠人格相联系，成为侠义精神的文学表征。剑意象的第二个基本内涵是抒发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雄伟抱负和才能不得施展、人生价值不能实现的失意、苦闷、彷徨和愤懑。剑意象的第三个基本内涵是礼赞高雅、真挚的君子友情和傲岸、高洁的人格。”详见刘爽：〈“楚辞”中剑意象的文化解读〉，《荆楚学刊》第14卷第6期，2013年12月，第28-47页；陈鹏程：〈略论魏晋南北朝诗歌中剑的意象〉，《新乡教育学院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12月，第58-60页。

⁶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站搜《全唐诗》，“剑”共出现1725次之多，<https://ctext.org/zh>（2024.6上网）；另外，亦可从“全唐诗检索系统”网站搜寻出1522笔与“剑”相关诗作，见于<http://cls.lib.ntu.edu.tw/tang/Database/index.html>（2024.6上网）。

⁷ 见中央研究院馆藏资源中“汉籍电子资料库”检索系统，<https://hanji.sinica.edu.tw/index.html>（2024.06上网）。

⁸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站搜《全宋词》，<https://ctext.org/zh>（2024.6上网）。

⁹ 本节之所以仅论“唐诗”，原因在于笔记、小说、话本等叙事文学内容庞杂，且对“剑”意象相关研究并未构成一套完整的论述系统；相比之下，撇除唐诗对剑意象研究之成果丰硕之由，诗歌作为一种精炼的文学体裁，其所凝聚的意象更为集中而鲜明，更能为本文的论述提供便利。若对比唐、宋诗：唐代诗歌出现“剑”字总数大大超越宋代诗词；二、观前人研究，唐代“剑”意象的内涵几乎已成定型，虽宋时“剑”之悲凉沧桑基调有异于唐之开阔、明朗，但宋人对于“剑”意象没有太大变化。是以为合说理由。唐宋“剑”意象的研究有：李宣良，辛玉红：〈倚天万里须长剑——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剑意象〉，《文史杂志》，1997年12月，第40-42页；张军，席饼嗣：〈剑的诗性存在：唐诗宋词中剑文化意象研究〉，《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2022年3月，第1916-1919页；王志颖：〈倚天万里须长剑：唐诗宋词中剑意象之嬗变〉，《名家名作研究》，第37-39页。

¹⁰ 以下说法皆参考蔡长娣：《唐诗中“剑”的意象研究》，第99-135页。陈可：《唐诗中的刀剑意象》，天津：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聂永华教授指导，2013年3月；陈戈：《唐诗中的剑意象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孟峰年教授指导，2020年6月；期刊论文有王力，郝明：〈剑术崇拜与唐诗中的剑意象〉，《中国韵文学刊》第2期，2003年，第25-32页；姜喜平，徐娥：〈论唐诗中的剑文化〉，《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第1期，第11卷，2012年2月，第147-148页；陈可：〈唐诗中的剑意象初探〉，《语文知识》第4期，2012年，见于第100、123二页。游添灯，韩·权五伦，卢亮廷〈咏剑入鞘——剑的文化衍行〉，《运动文化研究》第33期，2018年9月，页77-99。为方便阅读，不一一作注。

¹¹ 张祜〈采桑〉，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八册），卷51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2月，第5862页。

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¹²陈子昂“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¹³可见“剑”与“武功名”、“思报国”之理想抱负联系，许多时候也与边塞相关，表达出血气方刚的诗人满怀抱负、志在必得的气势：

第二、可以用来表达仕不遇，希望受到他人赏识。诗人会以“宝剑”自喻，或以“弹剑”、“抚剑”自述，如李白的“弹剑作歌奏苦声”、¹⁴袁瓘“宝剑中夜抚”¹⁵。另外，唐诗常常有“弹剑”、“弹铗”的运用，实际上是化用《冯谖客孟尝君》典故，钱起〈新丰主人〉甚至出现“冯谖剑”的用语，“客里冯谖剑，歌中宁戚牛。主人能纵酒，一醉且忘忧。”¹⁶陈可观察到，“求仕和不得重用，通常与剑的两种形态相关——拔剑出鞘与剑敛匣中。拔剑出鞘象征着积极求仕的壮心烈烈，剑敛匣中则喻示着怀才不遇的悲哀。”¹⁷此说洵为的见。可稍作补充的是，收在匣中的剑，通常都会发出“吼声”、“鸣声”表达激切想要备受赏识的强烈心愿：“腰间宝剑匣中鸣”¹⁸、“雄剑鸣开匣”¹⁹、“虚裘朝独坐，雄剑夜孤鸣。”²⁰

第三、“剑”具有肯定自己或他人的内涵。刘长卿“一从负能名，数载犹卑位。宝剑诚可用，烹鲜是虚弃”之“宝剑”乃肯定薛据的才华，并表示其才干已然得到施展的機會。²¹再如白居易贺李六景授唐邓行军司马“泥埋剑戟终难久，水借蛟龙可在多”²²喜言李氏之才能获得认可。郭震“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除了描绘宝剑的铸造须经过多年的炼造而成，其中以剑自喻其内在才华不凡、外表也令人叹为观止。

第四、剑作为一种有杀伤力的武器，具“惩奸除恶”的内涵。白居易“古剑寒黯黯，铸来几千秋。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²³之古剑乃用以斩断佞臣头。

¹² 崔颢〈杂曲歌辞·游侠篇〉，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一册），卷 25，第 332 页。

¹³ 陈子昂〈感遇诗·三十五〉，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二册），卷 83，第 891 页。

¹⁴ 李白〈杂曲歌辞·行路难〉，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一册），卷 25，第 343 页。

¹⁵ 袁瓘〈鸿门行〉，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二册），卷 120，第 1208 页。

¹⁶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四册），卷 238，第 2657 页。

¹⁷ 陈可：〈唐诗中的剑意象初探〉，第 100 页。

¹⁸ 失撰人名〈柘枝词〉，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一册），卷 22，第 289 页。

¹⁹ 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四册），卷 230，第 2512 页。

²⁰ 李绅〈到宣武三十韵〉，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八册），卷 482，第 5527 页。

²¹ 刘长卿〈送薛据宰涉县〉，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三册），卷 150，第 1551 页。

²² 白居易〈闻李六景俭自河东令授唐邓行军司马，以诗贺之〉，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七册），卷 439，第 4904-4905 页。

²³ 白居易〈李都尉古剑〉，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七册），卷 324，第 4669 页。

除此之外，元稹剑之用法更是多元：“剑可割犀兕，剑可切琼玖……剑隳妖蛇腹，剑拂佞臣首。”²⁴其中“犀兕”、“妖蛇”皆是佞臣之喻。

最后，剑作为与他者“情谊”之标志，多出现于送别诗。王维“沙平连白云，蓬卷入黄云。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²⁵、刘长卿“泛舟悲向子，留剑赠徐君。来去云阳路，伤心江水滨”²⁶、孟浩然“游人武陵去，宝剑直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²⁷三人“赠剑”以表示对对方的情谊。

总而言之，在唐诗中，“剑”被文人赋予多重含义，最常见的乃借剑言志、表达仕不遇之苦闷、肯定自己与他人之才华、惩奸除恶及去除奸佞、与他人情谊的象征。若考察《元刊杂剧三十种》，可以发现，除佚名《诈妮子调风月》、石君宝《诸宫调调风月紫云庭》、张国宾《相公寺公孙汗衫记》、孟汉卿《张鼎智勘魔合罗》、佚名《诸葛亮博望烧屯》此五部外，其他元刊杂剧皆出现“剑”字。其中，金仁杰《萧何月夜追韩信》出现“剑”字次数最多，高达13次；狄君厚《晋文公火烧介子推》次之，共8次；关汉卿《官大王单刀会》7次；佚名《汉高皇濯足气英布》出现5次；郑廷玉《楚昭王踈者下船》、马致远《泰华山陈抟高卧》、王伯成《李太白贬夜郎》、杨梓《承明殿霍光鬼谏》皆出现4次；纪君祥《冤报冤赵氏孤儿》、郑光祖《辅成王周公摄政》皆出现三次；佚名《小张屠焚儿救母》出现2次，余者十一篇皆出现一次。“剑”在杂剧也吸纳了文学意象传统，如马致远《泰华山陈抟高卧》：

第二折：【南吕一枝花】我往常读书求进身，学剑随时浑。读书匡社稷，学剑定乾坤。豪气凌云，心志如伊尹。本待交六合并吞，伐天下不义诸侯，救数百载生灵万民。……【贺新郎】我往常鸡鸣舞剑学刘琨，看三卷天书。²⁸

陈抟是个算卦的山人，但在年少时也曾以儒道治世为己任。回想过往时，提及曾读书以求能入仕为官、匡扶社稷，其用语为“学剑随时浑”、“学剑定乾坤”，

²⁴ 元稹〈说剑〉，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六册），卷397，第4473-4474页。

²⁵ 王维〈送张判官赴河西〉，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二册），卷126，第1269页。

²⁶ 刘长卿〈哭魏兼遂〉，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三册），卷149，第1538页。

²⁷ 孟浩然〈送朱大秦〉，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三册），卷160，第1669页。

²⁸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分别见于第103、105页。

又言自己学刘琨“鸡鸣舞剑”。显然，两处“学剑”及“闻鸡起舞”具有借剑言志的意义，盼能以勤学而有的己身之才安邦定国。后又提到“伐天下不义诸侯”，又见“剑”具“去除奸佞”之象征。

元刊杂剧时有以剑作为砌末者，²⁹常常承载并发挥文学之象征作用。好比郑光祖《辅成王周公摄政》：

第一折：【么】臣虽无能，辅朝廷。寄命叮咛，密旨亲听。社稷重兴，付能臣支撑。忠信难凭，天地为盟。上有沧溟。倘或天不容、吾皇驾崩。带云陛下放心！这公事便索行。临至日，若是上下交征，内外差争，老微臣怎地施行。（驾与剑了）这剑，折不臣夷背逆诛谗佞。圣旨道，无奎驾如朕亲行。臣既能如此持威柄，其教不严而治，其政不肃而成。³⁰

第二折：（带剑做住了）【普天乐】龙椅上紧扶着。大小官员扬尘舞蹈。若有个敢喧呼的，正犯新条。依班次休怠慢分毫。百官每听处分，一齐的忙呼噪。扶持着有德的君王，谁敢违拗？不是倩来的先君剑利水吹毛。他子索封侯拜爵，称臣上表，列土分茅。³¹

以上为周武王病中之际，交付托孤之重责大任于周公旦之情节，³²“剑”在此作为砌末无疑是重要的，象征着武王所授之至高无上的摄政权柄。从武王手中接过宝剑时，周公言道：“此剑，折不臣夷，诛逆斩谗。”可见，剑不仅象征帝王的威势，更寓意惩奸除恶、匡正天下之职能。到了第二折，武王崩逝，成王年幼即位，周公也带着象征武王权利之宝剑进行辅政。汪诗珮〈历史、戏剧、政治的三

²⁹ 如岳伯川《岳孔目借铁拐李》、杨梓《承明殿霍光鬼谏》、郑光祖《辅成王周公摄政》、金仁杰《萧何月夜追韩信》以及本篇所关注的《醉思乡王粲登楼》，此比例不容忽视。以上篇章皆可见于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

³⁰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页352。

³¹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页354。

³² 郑光祖《辅成王周公摄政》仅有元刊本，并无其他版本可参照。杂剧内容大意皆出自于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643。

重奏：《周公摄政》与郑光祖的双重心境》提到，“在普遍以虚构为主轴的元代历史中，此戏的‘纪实’、‘尚真’程度极高。其情节、本事出于《尚书》卷13〈金縢〉”³³，此观点洵为的见。但经查阅〈金縢〉，可以发现，“授剑”一事并未记载于《尚书》之内，可见郑光祖极力利用其作为曲家虚构的权利，特别借剑以艺术化历史、形象化武王及周公。

再举金仁杰《萧何月夜追韩信》以剑作为杂剧砌末之例：

第一折：（末抱篮背剑冒雪上开）……【混江龙】消磨了圣人之教。几时得经纶天地整皇朝。时遇着山梁雌雉，急切钓不得沧海鲸鳌。泪洒就长江千尺浪，气冲开云汉九重霄。胸次包罗天地，肺腑卷□江河，笔尖能摇山岳，剑锋可摘星辰。叹英雄何日朝闻道？盼杀我也，玉堂金马，困杀我也，陋巷箪瓢。……【天下乐】空教我日夜思量计万条。一回家心焦，何日了。越把我磨剑的志节懒惰却，空将文业攻，武艺学。

34

第二折：（正末背剑踏竹马儿上开）想自家离了淮阴，投于楚国，不用；今投沛公，亦不能用人。³⁵

金仁杰首先设计韩信在大雪天以“背剑”的形象出场，此“背剑”科范可深化韩信志气之形象。第一折犹提及韩信淮阴乞食，可见身上并无分文，而剑作为贵重之物，却出现于穷困的韩信身上，曲家用心昭然若揭：从【混江龙】之曲牌内容来看，自负的韩信言“剑锋可摘星辰”，可见抱负非凡；【天下乐】中“磨剑”一此或出自唐人贾岛“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³⁶，即表示自己长时期浸润于增进自己，韩信“磨剑的志节懒惰却”许是命运不济，因而偶发出的气馁嗟叹。

³³ 汪诗珮：〈历史、戏剧、政治的三重奏：《周公摄政》与郑光祖的双重心境〉，《国文学报》第50期（2011年12月），第287页。

³⁴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365页。

³⁵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368页。

³⁶ 贾岛〈剑客〉，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九册），卷571，第6675页。

第二节韩信仍然背着剑离开了淮阴，在此之前已到过楚国，然而不被重视，当下欲投靠刘邦，怎料刘邦也不用韩信。自第一折到第二折的背剑设计，韩信虽一直处于仕不遇的情况，却仍然渴望能够受到重用，此即宝剑所蕴藏的含义。

总而言之，无论所属文学题材为何，“剑”在中国文学中早已被赋予深厚而复杂的象征意涵。此一文化意象在杂剧创作中亦得以延续，曲家们不仅承袭自唐以来所形成的文化符码，更由于杂剧本具“可演”之特质，道具遂成为舞台表现中不可或缺的要害，让剑成为舞台上重要的砌末元素。通过这一文化符号的运用，人物形象得以进一步深化，其精神气质亦因而获得更具象的艺术呈现。元刊杂剧《王粲登楼》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剑文化”之下，对前人积累、沉淀的剑意象有所抉择与发挥。

三、“剑”意象的发挥：王粲的人物形象塑造与文武取舍观

元刊本《王粲登楼》一共出现七次“剑”字、两次“铗”字，其中又二度出现“弹铗”之语，与《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以及《史记·孟尝君列传》的典故有关。冯谖乃有智慧谋略的策士，虽为孟尝君的食客，在孟氏官运不顺遂之际，始终效忠其主。冯谖之弹剑于史传中暗含“借剑言志”、“仕不遇”之意。《王粲登楼》剑意象出自于此，也继承唐诗“剑”意象的“惩奸除恶”内涵。郑光祖于杂剧中设计的“剑”多以“实在的物件”方式出现，却发挥“意象”的作用，影响着“杂剧王粲”人物形象塑造以及王粲的“文武志业”。本节紧扣“剑”意象的发挥，论述曲家如何塑造王粲的人物形象，及如何突显出王粲或文或武之追求。

（一）王粲的人物形象塑造

王粲的形象是丰富且立体的，郑光祖按历史王粲作为小说人物原型，再从冯谖、韩信二者不同的面向丰富化杂剧王粲的形象，包括以冯谖弹铗與王粲不得志相联系；设计王粲频频以韩信材武自喻。

首先，对王粲人物的设置，与“剑”最相关者，乃“冯谖弹铗”典故，主要

作为王粲自喻其处境，即其身贫贱，一心想要求仕。故“剑”具有“人物贫贱求仕”之象征：

第一折：【仙吕点绛唇】虽是我家业凋残，少年可惯，人轻慢。

长铗空弹，贫贱非吾患。³⁷

第一折：【么】你个田文傲，怎做剑客看。³⁸

第三折：【中吕粉蝶儿】尘满征衣，叹飘零一身客寄。往常食无鱼，弹铗伤悲。³⁹

在杂剧楔子的部分，“蔡邕曾寄书给王粲，因着与王父同事之谊，要王粲至西京依附于他。”⁴⁰到了西京，“王粲因付不出房钱，遭投宿酒店的小二嘲弄”而发出感叹。王粲与冯谖处境完全一致，即“贫贱”且遭“人轻慢”。过了一个月，蔡邕始让王粲入府参谒，却遭到蔡邕怠慢。此时王粲把蔡邕比喻为孟尝君，自己作为蔡邕的投靠者，就有以冯谖自况的意味在。郑光祖有意刻画王粲作为文人不得志的处境，包括家里贫苦、家中尚有年老母亲还要奉养，出门在外又不受人重视，与冯谖的处境简直如出一辙，这对于铸造王粲“有才”、“有抱负”的形象有一定作用力。

在象征式语言设计，郑光祖对“弹铗”之寓意加入新意。王粲在获官之前两次“言弹铗”之由，皆因不知蔡邕实际上对自己是“外贬内扬”。蔡邕在暗中帮助王粲的状况下，让王粲从曹植处获得马匹、盘缠、举荐信：

第一折：【外云了】【子建分付与末了】【末云】小生与老兄往

日无旧，□赐黄金鞍马书呈，荐我荆州，此事未敢相忘。⁴¹

³⁷ 郑騫：《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45页。

³⁸ 郑騫：《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47页。

³⁹ 郑騫：《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51页。

⁴⁰ 汪诗珮简述《王粲登楼》的剧情，见于汪诗珮：〈世变、文人、隐喻——元杂剧《王粲登楼》的视界〉，第140页。

⁴¹ 郑騫：《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48页。

第一折: 【尾声】持翰墨谒荆州, 似展羽翼腾霄汉。子今梦先到
襄江岷山, 楚天阔宁如蜀道难。得了这白金骏马雕鞍, 我若是到荆樊,
则愿得人马平安。⁴²

对照《战国策》, 冯谖三次弹铗所获, 与王粲所受到的资助, 大抵类似。冯谖“居有顷, 倚柱弹其剑, 歌曰: ‘长铗归来乎! 食无鱼。’ 左右以告。孟尝君曰: ‘食之, 比门下之客。’ ” 此段所获的食物可与王粲所获“黄金”或“白金”对应——鱼、金二者皆确保冯谖、王粲衣食无虞。应当给予补充的是, 王粲并非因为“弹剑高歌”方获帮助, 而是在杂剧开始发展时, 已经说明是蔡邕自身要王粲到西京依附于他。另外, 冯谖于饮食上与他人有着明显的差异, 才首次借以弹铗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更好的食物。与蔡邕假他人之手直接赠送钱财给王粲的前提有所差异。但此处要表明的是, 两人所获的资助, 其性质有相近之处, 冯谖所获的车、房子, 与王粲所得马匹、书呈同理。又, “居有顷, 复弹其铗, 歌曰: ‘长铗归来乎! 出无车。’ 左右皆笑之, 以告。孟尝君曰: ‘为之驾, 比门下之车客。’ ” 此处可对照王粲所获得的“鞍马”、“骏马雕鞍”——代步工具让二者在行动上不受限制。冯谖仍不满意, “复弹其剑铗, 歌曰: ‘长铗归来乎! 无以为家。’ ……孟尝君问: ‘冯公有亲乎?’ 对曰: ‘有老母。’ 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 来到《王粲登楼》, 曹植(实际上是蔡邕)给王粲举荐书信, 待他功成名就以后, 能够与母亲一家团圆。⁴³

杂剧中, 除了两次口头上言“弹剑”外, 郑光祖也设计砌末, 即让王粲到荆州投靠荆王刘表时“背剑”:

第二折: 【正末背剑上云】自从离开洛阳, 一路上感得一场天行
病, 挣些送了性命。将鞍马卖了, 盘缠使尽, 不付能较。⁴⁴

⁴²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 第 448 页。

⁴³ 元刊本在第四折为大团圆结局, “(卜儿引旦上云了)”即指王粲功成名就以后, 与母亲、妻子团圆。见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 第 456 页。

⁴⁴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 第 448 页。

此处对王粲“背剑”的设计，绝非偶然，除了借剑来实指王粲的抱负之外，有趣的是，在王粲到盘缠用尽、把马卖了的时候，身边的剑却还留着。何以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仍坚持留下剑？蔡长娣《唐诗中“剑”的意象研究》曾论及“剑”的文化性质，其中一点便是“剑”的尊贵性：⁴⁵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游说于各个诸侯国，出入王侯将相府邸的知识之士，都会身佩宝剑，以提高他们的身份价值，旨在能得君王的赏识，从此摆脱平庸的地位。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缞。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客复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舆’。……‘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冯驩在被孟尝君赏识之前，即便“食无鱼”、“出无舆”、“无以为家”，一贫如洗，身边还是佩戴者缠有非丝非麻的蒯缞长剑，足见他对“剑”看中如同自己身份，以此标志自身价值。又如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虽然生活困顿，连衣食都成问题，但是“好带刀剑”，以此标识自己的崇高志向和尊贵身价。⁴⁶

同理，王粲自佩剑荆州，自然也如冯谖、韩信般，以剑标榜自己的身价，彰显出自己位分的尊贵性，希望能够得到在上位者的青睐。于是，身上佩剑可表现王粲自我标榜身价。

除了冯谖之外，王粲或把自己当作韩信、或把自己跟韩信对比：

⁴⁵ 蔡长娣认为“剑”的文化性质有四，包括尊贵性、权威性、神异性、宗教性。详见蔡长娣：《唐诗中“剑”的意象研究》，第三章：“剑”的文化性质，第45-74页。

⁴⁶ 蔡长娣：《唐诗中“剑”的意象研究》，第51页。

第一折：【鵲踏枝】我則待走上韩元帅将坛。⁴⁷

第二折：【滚绣球】荆王呵！你子索高筑黄金拜将台，更不索疑猜。⁴⁸

第二折：【倘秀才】论行兵呵，不让韩元帅九里山前大会垓，席卷江淮。⁴⁹

第四折：【乔牌儿】不由人肚里气夯，有什脸来到俺宴上。你个引韩侯三荐萧丞相，那时情今日想。⁵⁰

以上第一折为王粲欲与韩信同道，第二折乃王粲投靠刘表前的内心表白，即恳切希望能够如同韩信一样得到礼遇，第三折则夸赞自己的行兵方式可与韩信分庭抗礼。最有意思的是第四折，言蔡邕是萧何，言自己是韩侯。在杂剧当中，“韩信的现身出现”并不佩剑，但回顾《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韩信亦好带刀剑：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⁵¹

爬疏班固《汉书》及《资治通鉴》，并没有韩信佩剑细节之相关记载。观察时代与郑光祖相近的金仁杰（？-1329）《萧何月夜追韩信》，里头的“剑”出现高

⁴⁷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第446页。

⁴⁸ 其中“黄金拜将台”，涉及两个典故，即“黄金台”与“拜将台”的结合，其一为《战国策·燕策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讎。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和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对曰：‘……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其二为《史记·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载“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汉·司马迁撰，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167-3168页；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49页。

⁴⁹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50页。

⁵⁰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55页。

⁵¹ 汉·司马迁撰，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166页。

达十次以上，其中还有韩信两次的“背剑”舞台指示。⁵²于是，在至少在元代曲家里头，武官佩剑为自然现象，“背剑”并非单纯科范。本着王粲四次有与韩信对举的表述，显然曲家有意将韩侯部分形象施加于王粲身上，使其面目更为丰富。

总之，王粲的形象是透过“剑”塑造出来，其中因着“弹铗”，自比冯谖、韩信，而凸显其武人面貌，贴近史上王粲文武双全的形象。

（二）王粲的武将志业

王粲乃“建安七子”之一，翻阅《王粲集》，王粲留下的作品近有六十余篇，⁵³《三国志·王粲传》也多突出王粲文人形象一面，即再三勾勒出其学问、记忆力、文章皆有过人之处：

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暗诵乎？”曰：“能。”

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

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碁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校，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

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⁵⁴

虽然《三国志·王粲传》意在刻画王粲文人形象，但也没有忽略王粲作为武官的职位。⁵⁵换言之，史上王粲绝非文弱书生，而是担任军职幕僚，委于将军帐下，

⁵² 第一折有“（末抱篮背剑冒雪上开）自家韩信的便是……”，第二折“（正末背剑踏竹马儿上开）”。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分别见第365、368页。

⁵³ 汉魏·王粲著，俞绍初校点：《王粲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亦可见于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10月。

⁵⁴ 晋·陈寿（233-297）着，卢弼（1876-1967）集解：《三国志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2月，第508-510页。

⁵⁵ 《三国志·魏书》对于王粲武人形象着墨不多，针对王粲的才学多有描绘，且在为王粲立传以后，接着除孔融外，《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子”，包括徐干、陈琳、阮瑀、应瑒、刘楨，显然史书也意在凸显王粲

并曾跟随曹操南征孙权:

粲……后迁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侍中。⁵⁶

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⁵⁷

王粲写过从军的诗赋，如〈从军行五首〉、〈初征赋〉，在在可证明王粲并非只有“文”的层面，亦能为武协谋。⁵⁸郑光祖以王粲的〈登楼赋〉作为《醉思乡王粲登楼》的写作模板，⁵⁹表面上看来像是在点出王粲作为郁郁不得志的书生取向，实际上却是按照其历史上文武两面进行刻画，即曲家体认到王粲于史上作为文学家的身份，也认识到王粲曾任军职幕僚之位分。

然，杂剧王粲在文武官的倾向上曾出现些许变化。踌躇满志的王粲虽自言“文章不到得落于人后”、“不曾失于学问”，⁶⁰但其较倾向接受武职。第一折已多次表达希望能够发挥材武之强烈愿望：

【哪吒令】（云）大丈夫仗鸿鹄之志，据英济之才。我则待大走上韩元帅将坛。⁶¹

【么】得见天颜，列在朝班。书吓南蛮，威慑诸蕃。内并奸谗，外震边关。整顿江山，平治尘寰。紫绶乌靴象简，不教人下眼看。这□□身闲，尘土衣单。……也须有个天数循环，轮还我不平奋气空长叹，充塞乎天地之间，那漫漫长夜何时旦。看斩蛟北海，射虎南山。⁶²

于文学的地位。晋·陈寿着，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2月，第510-514页。

⁵⁶ 晋·陈寿着，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第509页。

⁵⁷ 晋·陈寿着，卢弼集解：《三国志集解》，第510页。

⁵⁸ 俞绍初辑校《王粲集·从军行五首》时曰：又李善注《文选·从军诗》“凉风厉秋节”句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粲从征吴，作此四篇。”；又，吴云、唐绍忠注〈出征赋〉言，“《魏志·武帝纪》：‘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十二月，军还谯’由此可知建安十四年（公元二〇九）自春至冬曹军均在征战之途，王粲随曹往还，故有此作。”以上见于汉魏·王粲着《王粲集》，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修订本），第102页；汉魏·王粲着，吴云、唐绍忠注：《王粲集注》，郑州：中州书画社，1984年3月，第45页。

⁵⁹ 详见汪诗珮：〈世变、文人、隐喻——元杂剧《王粲登楼》的视界〉，第125-155页。

⁶⁰ 见楔子、第一折王粲的宾白。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分别见第445、447页。

⁶¹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46页。

⁶²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47页。

【醉扶归】论文呵，笔扫云烟散。论武呵，剑射斗牛寒。扫荡妖氛不足难，折末待掌帅府居文翰。不消我羽扇纶巾坐间，敢破强虏三十万。⁶³

上述曲文为王粲前往西京依附蔡邕，乃至遭蔡邕怠慢的时期。在此期间，王粲欲为元帅一职的愿望相当强烈，表明自己“待大走上韩元帅将坛”、“书吓南蛮，威慑诸蕃”、“待掌帅府”且又要“居文翰”。是以，王粲被郑光祖赋予武官意念，应当来自韩信，而非冯谖。自第二折“正末背剑上”以后，其当武官的心愿从此不动摇：

【滚绣球】荆王呵！你子索高筑黄金拜将台，更不索疑猜。⁶⁴

这句话为王粲的独白。当王粲“唱”此曲词时，身旁并没有出现“他者”。当只有“王粲一人”进行叙说时，此时更能透露出王粲的心境——他一心一意渴求的是武官官职。因此，可以看到王粲运用“黄金拜将台”典故，是希冀能够受到如韩信一般的对待。更重要的是，其为大将之愿望得以被凸显出来。

再者，他甚至明确表达舍弃文士身份的说法：

第二折：【尾声】他年不作文章客，异日能为将相材。待与不待总无碍，时与不时命将耐。论地谈天口若开。伏虎降龙志不改，有一日拜取与刘大元帅。⁶⁵

于是，我们能够看到“剑”在杂剧中扮演着不可或缺重要的角色。除了塑造王粲的形象之外，还能借着“背剑”装扮意在凸显出王粲的武将志向。“剑”从第

⁶³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48页。

⁶⁴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49页。

⁶⁵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50页。

一折到第三折或隐或显的出现, 始终贯穿全剧, 甚至第四折王粲成功当上将军, 也是经由“剑”意象的发挥:

【正末整扮元帅】

【驻马听】一封诏赴阙来王, 纠纠威风壮纪纲。万言策出朝为将。

66

郑光祖通过剑的意象, 突出史上王粲“武业”志向。正是因为透过“剑”、“背剑”, 也能展示王粲胸有大志, 抱负不凡, 藉由“弹剑”, 带出王粲的郁郁不得志。曲家以王粲比冯谖, 意在彰显王粲的贫穷、渴望受到重用; 以王粲比韩信, 欲借韩信说明王粲的从武志向、其才华之出众, 再次凸显王粲的武将倾向。

四、明本对“剑”之改动及对人物塑造的影响

如前所言, 杂剧《醉思乡王粲登楼》留下来的版本除了元刊本以外, 尚有其他三本明本。元代杂剧传至明代宫廷后, 遭到大幅改动, 现所留存的明本皆非元时原貌。⁶⁷“元刊本”《王粲登楼》设计“剑”意象, 意在塑造王粲的武将志业, 到明代也遭明人改编。从这个角度重新评价《王粲登楼》, 便能看出元刊本的艺术价值与意义, 尤其针对郑光祖欲发挥出王粲形象而伏线千里的“剑”意象, 在经过对比明版后, 更觉其精彩之所在。尚须一提的是, 《古名家》本受到明内府本影响, 后来影响到臧懋循所编《元曲选》, 而孟称舜《酌江集》又受到《元曲选》的影响。是以, 若要观察“元刊本《王粲登楼》被改动之源头”, 现留下来的, 仅有《古名家》本。⁶⁸是以此节将按《古名家本》作为比较版本。

《古名家杂剧》乃案头读本, 故为科白完整之本。相比于元刊本, 古名家本《王粲登楼》的内容增多, 或情节遭到更动, “剑”意象的份量显然不够突出。

⁶⁶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 第454页。

⁶⁷ 详见荷兰·伊维德, 宋耕译:〈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文艺研究》第三期, 2001年, 第97页。

⁶⁸ 见美·奚如谷:〈文本与意识形态——明代编订者与北杂剧〉, 收录于《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奚如谷卷),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8年12月, 第231页。

两本王粲对待剑的方式有所不同也影响王粲形象的塑造。另外，翻看改本，改本出现的人物包括蔡邕、曹植、东道主，各个满口离不开父慈子孝、仁义道德，改本的王粲也多站在儒家立场发言，致使王粲武将志业“失焦”。此为元本明本之差异。是以，本节拟就：一、《古名家本》对元刊本“剑”意象的改动；二、《古名家本》王粲的人物形象为题，讨论改本对“剑”之改动及如何影响到王粲的形象塑造。

一、《古名家本》对元刊本“剑”意象的改动

古名家本《王粲登楼》也出现大量“剑”字，有的仍然延续了元刊本的设置，保留于改本之中，有的进行改动。

不论元、明二本皆由王粲前往荆州依附蔡邕，到外地投宿的情节。就在王粲付不出房宿饭钱时，直接将身上配剑当给店小二：

（小二）闲话休说，好歹要房宿饭钱。（末）小生没什么。二哥，
我将这口剑当与你，待我见了叔父，便来取讨。⁶⁹

在王粲艰难的情况下，典当剑以偿还房宿饭钱。作为现实层面而言，不失为一个好方法。若顾及杂剧的艺术性，典当剑的举动，则失去“剑”在古典文学中能够发挥意象的特殊性——即连带元刊本第二折王粲应该要有的“正末背剑”也一并抹去。是以，“剑”在明代改本，仅能从王粲口中的“弹剑”以“渴望受到重视”的内涵出现，直到王粲实现成为大元帅的心愿得到满足，始终无法作为一个意象的“有机体”贯穿全剧。作如此解读，也出现一个问题：若明改本的“弹剑”作为王粲“借剑言志”的方式，那么“典当剑”的举动，是不是表示王粲放弃现实的功名进取的表征？⁷⁰再者，王粲直到后来当上“天下兵马大元帅”也没有将其

⁶⁹ 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辑：《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码不清，故本文仅注折数。《古名家本》引文皆用此本，不再另外作注。

⁷⁰ 高文秀《好酒赵元遇上皇》第二折【感皇恩】云“可知道李太白留剑饮，典琴沽”，即谓李白即使已无酒钱，身上有价值的物件有剑、琴，其选择的是典当琴以沽酒，而非以剑作交换。无独有偶，王伯成《李太白贬夜郎》第二折【滚绣球】正末李白自言“这酒，寻芳踏雪沽，弃琴留剑与。便待交我眼睁睁死生无路，莫不仕途中咒我胡突。对着山河壮帝居，乾坤一草庐，便是我画堂深处。那吓蛮船似酒面上浮蛆，不恋着九间天子长朝殿，曾如三尺黄宫旧酒垆，但行处挈榼提壶”亦为一例。详见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引文分别见页67、246。

剑赎回。按此思路看来,显然元刊本让王粲“背剑”的设置比较精彩。⁷¹此为“剑”之改动。

在元刊本《王粲登楼》杂剧里头,“剑”时常与历史名人同时并举,具有丰富化王粲的人物形象的效果。但改本对元本的曲牌进行多处删节,以至于王粲“武士”的形象被淡化。以下为元刊本中被《古名家本》删去的曲牌:

第一折:【么】你个田文傲,怎做剑客看。待贤知得伊辞惮,学鸡落得人轻慢。无鱼赢得咱悲叹。你虽然紫袍金带禄千钟,不敢养锦衣绣袄军十万。⁷²

第一折:【醉扶归】论文呵,笔扫云烟散;论武呵,剑射斗牛寒。扫荡妖氛不足难,折末待掌帅府居文翰。不消我羽扇纶巾坐间,敢破强虏三十万。⁷³

【么篇】虽然不是单单以名词“剑”或动词“弹剑”出现,但将整个曲牌与“你个田文傲,怎做剑客看”尽数删去,着实削弱王粲于元刊本的负气、血气方刚的样子。另外,元刊本中,因着王粲或隐或显,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比作冯谖,渴望得到蔡邕的提拔与帮助,此处将抱怨蔡邕的“你个田文傲”句剔除,使得蔡邕作为田文孟尝君的角色难以被支撑起,也难以将王粲与冯谖作平行对举。除此以外,前已言明剑具有斩妖除魔的性质,在文学意象中,文士常将剑作为惩罚奸恶的象征。【醉扶归】的曲辞,王粲言自己“论武呵,剑射斗牛寒。扫荡妖氛不足难”,基于此句被删,剑作为“扫荡妖氛”的意涵也不复存在。此处还涉及到王粲自比周瑜,若要建构出王粲意气风发、挺拔豪迈,“不消我羽扇纶巾坐间,敢破强虏三十万”应当保留于杂剧为宜。

总而言之,“剑”在《古名家本》的大幅改动,让剑应当发挥的意象失焦,

⁷¹ “背剑”在元杂剧中,《王粲登楼》并非独立个案。此前言金仁杰《萧何月夜追韩信》也出现两次“背剑”。狄君厚《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第三折有“(末素扮引外背剑上开)”;杨梓《承明殿霍光鬼谏》第一折“(正末重扮霍光带剑上开)”。详参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分别见第278、305页。

⁷²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47页。

⁷³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48页。

连带造成王粲的形象模糊，其文武观也无法被凸显出来，甚至《古名家本》补上众角色的宾白后，有意彰显的是王粲“文士”形象。

（二）《古名家本》王粲的人物形象

在古名家本中，大量渲染王粲的书生身份，即经由各角色口中，肯认王粲是读书人，学问非常好。基于王粲的文人角色，改本让其言语间夹杂诗词、引经据典。受儒家经典影响的王粲，在此特别突出“孝”之形象。此皆为改本对王粲形象所作出的更动。

首先，从楔子始起，王粲的母亲、蔡邕、曹子健都肯定王粲“学成满腹文章”，王粲到投宿的店家，遇到店小二一而再地表示王粲是“读书人”，就连王粲自己也自认为是“书生”：

楔子：（卜儿上）王粲……学成满腹文章。（正末上）小生姓王名粲，字仲宣……正在草堂攻书。⁷⁴

第一折：（小二）王先生，你即是读书人，可不寻几个相识朋辈。……你即是个读书人，何不训几个童蒙，讨些钱钞还我。可不好？……（孤扮蔡邕引众人上）王默所生一子，名唤王粲……王粲学成满腹文章。……（应科冲末扮曹子健上）今早朝蔡邕老丞相说伊令婿王粲学成满腹文章，有经纶济世之才，补完天地之手。……（末）叔父，我王粲一日为官不在你之下。男儿自有冲天志，不信书生一世贫。

虽然元刊本缺乏完整的宾白，没有否认王粲为士人的身份，但基于王粲“弹剑”、“背剑”，致使他的书生面貌令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⁷⁵元刊本没有让王粲过多呈现出其“满腹文章”，但《古名家本》在王粲的宾白中，让其吟诗作对：

⁷⁴ 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辑：《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85年。

⁷⁵ 元刊本第一折“【油葫芦】你休笑我书生胆气寒”，王粲是承认自己具书生身份的，但这不妨碍其当将帅愿望。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46页。

第三折：（正末上）时遇好天，好是伤感人也。一度愁来一倚楼，
倚楼又是一番愁。西风塞雁添愁怨，衰草凄凄更暮秋。情默默，思悠悠，
心头才了又眉头。倚楼望断平安信，不觉腮边泪自流。

此为王粲失意以后，赴许安道邀约，于赴约途中心有所感，随口吟咏〈鹧鸪天〉。此为元刊本所没有的情节，显然是明人所增补。在二人正要登楼赏景之际，王粲吟王之涣〈登鹳雀楼〉及李太白〈夜宿山寺〉，都只是为了展示诗才：

（东）欲穷千里目，（末）更上一层楼。……你看那危楼高百尺，
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除了诗词的吟咏，改本也大量引经据典。就在母亲让王粲上京依附蔡邕时，王粲百般推脱，引了《论语》、《通典》作为理由：

（卜）孩儿，你叔父蔡邕丞相数次将书取你。今日好日辰，你上京去，求的一官半职，光耀门闾，有何不可？（末）母亲，你孩儿去不的。……父母在堂，不可远游，游必有方。出不异方，复不过时。此乃人子之道也。

以上“父母在堂，不可远游，游必有方”出自《论语·里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⁷⁶；“出不异方，复不过时”则出自《礼记·玉藻》“出不易方，复不过时”，⁷⁷改本引此二句，已然凸显王粲的孝道。王粲又言“此乃人子之道也”，

⁷⁶ 魏·何晏：《论语何氏等集解·孝经唐玄宗御注》（论语卷4），台北：中华书局据永怀堂本校刊，1966年，第5a页。

⁷⁷ 唐·孔颖达撰：《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中册）卷4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870页。

显然改本有浓厚的说教意味在。待母亲言“孩儿放心前去，家中事务，我自支持”后，王粲才肯远行。针对王粲上京的情节，《古名家本》的王粲较为被动；“元刊本”则不然，展现出的是王粲的斗志昂扬、锐意进取。可对照两本王粲远行的态度：

元刊本楔子：（末云）母親放心！即丞相寄書來，到那裡，看俺父親面，也好歹覷當您孩兒。況兼文章不到得落於人後，取皇家富貴，如同掌上觀文。母親休憂，您孩兒須索走一遭去。⁷⁸

古名家本楔子：（末）母親，恁的孩兒今日便索長行。

结合此前的引文来看，元本王粲的斗志旺盛、满怀信心的形象鲜明，改本则是意在显现王粲“孝”的面向，上京取官也只是按照母亲的意思。又，在第三折王粲遇见的东道主许氏，许氏对王粲的评价也在于“孝”：

（副末扮东道上）此人不醉犹可，醉呵思其老母，虑其乡闾。

（东）仲宣不登楼便罢，但登楼便思其老母，慕其乡闾。

于元刊本中，许氏宽慰王粲，并无其他戏份；明本有意于许氏身上着墨，堆叠儒家父慈子孝之宣言。⁷⁹在明改本，许多人物都是“儒家代言人”，包括蔡邕、曹子健、荆王、东道主上场都会表述自己学的是儒家经典。⁸⁰本文意在表明的是，

⁷⁸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45页。

⁷⁹ “子忧其母，孝也；母思其子，慈也；父母之道，天性也；君臣之道，仁义也；朋友之道，信行也；夫妇之道，和顺也。岂不闻忠乃三纲之首，孝乃白行之原。忠则顺天，孝则生福。父母生其子，必望显达也。惟亲贤以教其子，故子以孝承其亲。虽然孝子之为道，不待教而进，子当先尽其孝矣。予思大舜古之圣人也，父顽母嚣弟傲，尝设计害舜，舜尽孝以合天心，终不能害舜。舜耕于田亩之中，号于旻天，非舜怨其父母，特怨自己不得于亲也。舜曰：我之孝者方尽，则父母必慈舜之孝亲，合其天也。自古忠良取孝名。恒合天地，享峥嵘升腾，报答白头。母莫负登高嘉意情。”东道主许达肯定王粲的孝，此后再言说儒家五伦，进一步论舜之孝，实为“硬性植入”，即与故事情节并非有机的整体。是以明人改本多有儒家说理意味。

⁸⁰ 第一折：（孤扮蔡邕引众人上）龙楼凤阁九重城，新筑沙堤宰相行。我贵我荣君莫羡。十年前是一书生。老夫姓蔡名邕，子伯皆，陈留郡人氏，幼习儒业，颇看诗书。

第一折：（冲末扮曹子健上）满腹文章七步才，绮罗衫袖拂香堦。今生坐享来生福，不是读书那里来。小官姓曹名植，字子建，祖居谯郡沛县人也。幼习儒业。

第二折：（外扮荆王引众上）汉祖兴刘四百年，孤家海外觅英贤。八方完治分疆土，御书礼乐尽依然。某

众多角色自小就学习儒学经典，就连主角王粲不免于此，《古名家本》倾向从“文人”视角塑造王粲，包括其“剑”的取舍，以致王粲除了心高气傲以外，缺乏比较“正向”的形象。此前已有表述，对比元明二本，王粲在付不出房宿饭钱时所采取的态度，前者面临艰难，也不把剑典当；后者不选择训童蒙赚取学费缴还债务，却直接典当重要物品，不可谓后者的人格力量较为薄弱，以至于在遇到挫折时，其以轻生作为应对方式：

第三折：【么篇】小生为功名不遂其心，不如饮一醉，坠楼而亡。

(做跳科)

要澄清的是，《古名家本》对于剑的改动会造成王粲形象的整体变化，然剑之改动与王粲的“做跳科”与否没有必然联系。但推敲改本加此情节的用心，显然欲增加王粲的心性高傲，无法接受人生的失意，殊不知连带的却给王粲带给较负面的形象。另外，失去剑的王粲，似乎也失去人格之“尊贵性”：

(二净) 贤士，你可晓得那鹤非染而自白，鸦非染而自黑。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二人有一拜。(拜科) (末不理科)

(末睡科。荆) 才和俺攀话，又早睡着了也。便好道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俺未曾重用，先失左右之门风。正是那才有余而德不足……德胜才过乃栋梁，才高意大必踈狂。

(使) 小官天朝来的使命，宣王仲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快报伏去。(东) 王仲宣，王仲宣。(末) 做什么大呼小叫的。(东) 今有天朝使命宣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末) 来了不曾。(东) 见在楼

姓刘，名表，字景升。我是那刘之宗亲，汉之苗裔。幼习儒业，颇看兵书。

第三折：(副末扮东道上) 圣德弘深万古留，寒窗静坐几春秋。一朝金榜名标上，方显男儿志已酬。小生姓许，名达，字安道，乃荆州饶阳人也……颇通先圣之礼。出自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辑：《古本戏曲丛刊四集》。

直下哩。（末）慌做什么，忙做什么。既来了，怕他回去了不成。

刘表门下蒯、蔡与王粲相见时，王粲全然“不理科”，实为无礼的举动。又，刘表谈话时，当场“做睡科”，显然王粲并没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撑起基本的礼仪。第三，当朝廷使命宣召时，却有意“怠慢”。所有举动表示王粲虽“学成满腹文章”、“有经纶济世之才”，却是荆王刘表所言“才有余而德不足”，“才胜德为小人”。再举一例，早在王粲首次见到蔡邕时，蔡邕有意涵养其锐气，故三次“酒似与不与”轻慢王粲。王粲成为元帅后，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三次敬酒，也“似与不与”轻慢蔡邕。⁸¹如同牟宗三于《中国哲学十九讲》言：

事实上生命强的人不一定道德高、智慧高，而是道德高、智慧高的人生命一定强。此所谓的生命强，不指肌肉的强健，而是指心灵力量（mind energy）。既不能说生命强的人就道德高、智慧高，因此就不能由生命强来立道德、智慧的标准，而应从理性处决定……现代人的生命完全放肆，完全顺着自然生命而颓溃烂，就承担不起任何的责任。人的生命当由自然生命反上来，不能完全放肆。……相当程度的拘束、克己复礼并不错，这是振拔自己的生命而能有所担当；完全松弛即放肆，就什么都不能承担了，这是很可怕的。……贵是属于精神的（spiritual），富是属于物质的（material），二者是不同的。……周公制礼作乐，礼就是 form（形式），人必须有极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把这个 form 顶起来而守礼、实践礼。春秋战国时代人才辈出，就是因为在那一个贵族社会

⁸¹ 第四折：（蔡）罢罢，我自己进去。（见科）元帅，几年不见，受老夫一拜。（正末云）住者。左右，将过锦心拜褥来。（蔡）要他做什么。（末）则怕拜下去污了你那锦绣衣服。（蔡）可早两句了也。（末）却不道锦堂客至三杯酒，茅舍人来一盏茶。我是个新帅府，岂无一杯酒管待？左右，将酒来。（卒）酒在此。（末）道一杯当从丞相饮。老丞相接酒。（蔡）将来。（末）住者。小官有失礼体，放着翰林院大学士在此，当从学士请酒。（曹接酒科末）这杯酒可到老丞相。老丞相接酒。（蔡）将来（末）住者。慌做什么，忙做什么。学士饮个双杯。（曹饮科）（末）这杯酒可该老丞相饮，丞相接酒。（蔡）将来。（末）住者。两只手捞菱般相似。大缸家酿下酒抹盂里。折的你也吃不了，枕着青石极睡，饿破你那脸也。学士，饮个三杯和万事。出自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辑：《古本戏曲丛刊四集》。

中，能振拔生命，顶起形式而有所担当的人较多之故。⁸²

反观元刊本的王粲，面对以上处境时的其展现的态度：

第二折：（做背科云）荆王门下贤士多，我若不轻傲着呵，便小小看我，我且傲着。（傲饮了）⁸³

第四折：（外上开□□了）（与外见了）（外云了）⁸⁴

相较改本，元本的王粲面对蒯、蔡二人时，并非采取“不理科”，而是在经过思考下而选择“傲饮”。虽“傲”的方式仍然无礼，但元本王粲确实站在荆王的角度进行理性的思考所作出的举动，相比改本的王粲行为，自有其道理。另外，在接见朝廷使臣时，改本呈现出来的是过度傲慢乃至无礼的王粲，元本的王粲并不会“为了傲慢而傲慢”，是直接“与外见了”。观两本“正名”：

元刊本：荐贤士蔡邕闭阁，醉思乡王粲登楼

古名家本：荐贤士蔡邕背□，醉思乡王粲登楼

两本给王粲的定评都是“贤士”。所谓“贤士”之意应当为“志行高洁、才能杰出的人”，对比元、明本，显然前者更符合“贤士”之意；后者甚至已经被荆王批评为“小人”，是明本在改编时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此为本文试图为两本王粲形象作的另一种解读。但仍可进一步扣问的是：何以明本会做出改变，即如此轻易地放弃“剑”的文学传统其内在意蕴？⁸⁵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高彦颐（1957-）曾以“铸剑：从干将莫邪故事的流变看儒家伦理的转型”为讲题，特别以“情感结构”为切入点，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战士在战场上用剑

⁸² 牟宗三着：《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国哲学之简述及其所涵盖之问题》，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第162-164页。

⁸³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50页。

⁸⁴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第453页。

⁸⁵ 此文曾于2024年11月26日发表于马来亚大学“班峇谷研究生学术论坛”，承蒙香港中文大學盛亦惠老师提点，赐予宝贵指教，谨此致谢。该问题与观点亦发端于盛亦惠老师。

术作为武器杀敌与自卫之间的心理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如何影响他们与现实之间的情感关系及集体心理。高氏认为，在这一时期，战斗形式逐渐呈现“个人化”的特征；尤其吴越地区以步兵为主，作战多为一对一的近身搏斗。因此，战士格外重视操剑所需的身体技艺，将之视为个人修炼的重要途径，并不断通过自我锻炼以求身心的改造与提升。⁸⁶於是，若我们按此思路一窥明代作战形式，以及认识“剑”在明代的用途，便可一解明人改编杂剧“剑”取向之缘由。

自秦国大一统至明代以来，南北文化在长期交流与渗透之中逐渐趋于融合，其旧制为明人或扬或弃，此于军事装备有所体现：

中国兵器的发展，从北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火药应用于军事以及火器的创制与发展。从此结束了冷兵器独占的时代，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宋代开始创制和使用火器。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有很大发展，并已出现了原始的管形火器。⁸⁷

从上述引文来看，战场的军事装备不再只有冷兵器，而是还有杀伤力、破坏力更强的火器成了重要选项。就冷兵器而言，剑为军事配备兴盛时期，持剑者除了要有一把好剑，但更重要的，还须提高自己的剑术。剑术之高下，很大可能决定了其在战场上的存活率。於是，人、剑的关系相对紧密。虽然，火器的威力更为强大，但其运用不仅须考量地形与战略布局，亦需依循指挥调度。此时，将士多掩

⁸⁶ 高彦颐以干将莫邪故事作为考察对象，提出春秋公元前约 650-450 年乃干将活跃时期。特别是在南方吴、越、楚三国争强争霸促进南方兵器与剑术的发展变化。由于吴越地区乃水乡泽国，水战虽占主导地位，但仍须有步兵上陆，与北方敌国之兵单打独斗，从而对剑的结构，包括其长短、刚柔之间的平衡及灵活性有更高的要求，推动铸剑技术的进步。故此兵器成了南方“特产”，中原地区仍须向南方求剑。美·高彦颐：“铸剑：从干将莫邪故事的流变看儒家伦理的转型”，第十五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香港历史博物馆，2024 年 11 月 9 日，YouTube 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oBCM71dWLS>，浏览日期：2025 年 10 月 16 日。另外，敬晓庆等人指出“在战国以前，皆以车战为主。”然而战车也有其弱点：“战车车身庞大，运转十分不便，如果碰到复杂的地形，则基本处于进退不能的瘫痪状态，所以需要步兵担负辅助任务”。“战国中后期，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式逐渐变成车兵、步兵、骑兵协同的作战方式……于是，作为护身兵器的剑随着兵种的变化得以发展。剑在近距离拼杀上的优势使得其作为制式标准的武器开始在汉代军队配置。”以上引文见于敬晓庆、于孟晨、师爽：《中国兵器文化概要》，西安：西安出版社，2017 年 06 月，分别见于页 6 之注 1、页 37、240。虽然高彦颐、敬晓庆等人指出“剑”最初被纳入军队装备的时代尚有争议，然而，剑的出现却展现出有别于一般兵器的特质。无论是在以单兵对敌为主的步兵体系中，作为个人搏斗的利器，或是在日常修炼中用于强身健体，乃至文学领域的象征性书写中，剑皆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个人性”，即个“人剑关系”层面之意义。

⁸⁷ 郭汝瑰等著：《中国历代军事装备》，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 年，页 167。

身于火器之后，战争胜负与个人性命遂交付于炮火威力与军事指挥之谋略。有基于此，士兵不必手持长剑、身披铠甲与敌军进行肉搏战，人与剑之间的依存关系遂告瓦解：军队更倾向使用火器作为战争配备，是以使用冷兵器的人数相对较少。换言之，自宋代有了火器以后，冷兵器不再如往日那般在军事上具有唯一性的优先地位。虽言如此，宋至明代仍有格斗兵器，其中包括枪、长柄刀、铍钺类等。⁸⁸有趣的是，郭汝瑰等人特别指出“明代军队里已不用剑而用刀”⁸⁹。又，林智隆、陈钰祥所编著《明代兵器研究初稿》进一步举证：

隋唐时期，配剑风尚极为盛行，剑多用于朝廷服仪制度上，据文献记载可知，剑在战场上已无实战功能，多用在象征地位与朝廷官员服仪礼节之上。……明代天启年间杰出的军事家茅元仪……在剑谱的序言中写道：“古之剑可施于战斗，故唐太宗有剑士千人，今其法不传。断简残编中有诀歌，不详其说。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鲜，其势法具备。固知中国失而求之四裔，不独西方之等韵，日本之尚书也。”茅元仪在《武备志》卷一百四《器械三》中，论剑“茅子曰：古之言兵者必言剑，今不用于阵，以失其传也。……”⁹⁰

总而言之，从现实层面来看，随着具高效毁伤能力的火器出现，再加上其他更适于实战与防身的冷兵器不断发展，剑在战场上遂逐渐失去其实用价值。易言之，剑作为言志载体、作为渴望为朝廷建功立业此一象征，在明人的语境与物质文化之中逐渐淡出。于是，明本《王粲登楼》对于“剑”意象之更动可谓具有很高的现实依据，王粲当剑的原因昭然若揭：意即在有了火器的时代，明人不以武、以剑作为报国象征，亦不必依赖剑术以求军战存活，更无须时时执剑练习。就此而言，人对剑的情感已难以建立，人剑关系趋于淡化，在身无分文时将“无用之剑”典当以抵销房宿饭钱也是合乎情理之事。

⁸⁸ 详参郭汝瑰等著：《中国历代军事装备》，页 299-314。

⁸⁹ 详参郭汝瑰等著：《中国历代军事装备》，页 308。

⁹⁰ 林智隆、陈钰祥编著：《明代兵器研究初稿》，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9年12月，页 25-26。

五、结语

本文讨论了剑在唐诗发挥的意象、剑在元刊杂剧对人物形象所起的作用，再比较明代《古名家》对剑之改造及王粲形象的浮动。

研究发现，唐宋代的“剑”意涵的“言志”功能、表达“仕不遇”之愁苦，被曲家融入创作中。杂剧反复出现“弹剑”，即从“冯谖客孟尝君”的典故而来。王粲频频自比冯谖、韩信，虽用意各不同，却都是郑光祖为铸造王粲“武将”志业之用心。史上王粲能文能武，元刊本的设计较符合历史王粲的形象，且也增补王粲在历史中武人形象的空缺。《古名家本》为明人改本，对“元刊本”剧情并无太大改动，但对于“剑”的呈现有更动的部分，进而影响王粲原来的形象。《古名家本》保留了许多元刊本有关“剑”的文句以及王粲自比冯谖、韩信的自白，却让王粲“当剑”以付投宿的房宿饭钱，此改动模糊王粲的形象，也让“剑”的文学意象得不到好的发挥。由于“剑”本身具“尊贵性”，失去“剑”的王粲，似乎也失去人的精神力量，改本“为傲而傲”让王粲做出许多无礼的事情。于是，两本杂剧正名言王粲为“贤士”，“才胜于德”的明版王粲显然是不合格的。此外，改本除了改动“剑”的去向使得王粲形象较为平面，其为王粲注入几次的吟诗、各家对其评语，都一致肯认王粲文人身份，可以说《古名家本》相较“元刊本”较倾向从文人的视角看待王粲，针对王粲的形象也难免有所限制。经过两本对比，从文学艺术层面而言，“元刊本”王粲形象较为丰富，文学意象也高妙。本文也不忽略明本《王粲登楼》不足之缘由，试图从明人的剑文化，甚至军事文化加以推敲明本删削“剑”之缘故。从这段考查得知：自宋代火器发明始起，自先秦以来“剑”具“个人性”的特征已逐渐削弱，至明代也已不作为军事武器，剑自然已无杀敌报国之用。对于明代士大夫而言，此或许也逐渐不被视作施展抱负之载体，因而可以取消元刊本对王粲背剑的设计。由此可见，文学文本在艺术性方面的缺失并非单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内在原因，这一发现为我们理解文本提供了新的反思视角，亦是本论文提供的另一重学术价值与意义。

征引文献

古籍

- 汉·司马迁撰，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 汉魏·王粲著，俞绍初校点：《王粲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汉魏·王粲著，《王粲集》，收录于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10月。
- 汉魏·王粲著，吴云、唐绍忠注：《王粲集注》，郑州：中州书画社，1984年3月。
- 魏·何晏：《论语何氏等集解·孝经唐玄宗御注》，台北：中华书局据永怀堂本校刊，1966年。
- 唐·孔颖达撰：《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今人论著

- 郭汝瑰等著：《中国历代军事装备》，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
- 贾锡信：〈试论“王粲登楼”〉，《河北大学学报》第2期，1984年，第80-86页。
- 林智隆、陈钰祥编著：《明代兵器研究初稿》，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9年12月。
- 刘爽：〈“楚辞”中剑意象的文化解读〉，《荆楚学刊》第14卷第6期，2013年12月，第28-47页。
- 陆林：〈“郑”是郑廷玉说难以成立——兼议郑光祖生年〉，《元代戏剧学研究》，第75-79页。
- 牟宗三著：《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国哲学之简述及其所涵盖之问题》，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
- 汪诗珮：〈历史、戏剧、政治的三重奏：《周公摄政》与郑光祖的双重心境〉，《国文学报》第50期，2011年12月，第275-313页。

邓诗樱，从“剑”意象出发的对照：谈元刊本与明本《王粲登楼》

汪诗珮：〈世变、文人、隐喻——元杂剧《王粲登楼》的视界〉，《汉学研究》28卷1期，2010年3月，第125-155页。

叶杰英：〈困顿与凄怨——杂剧《王粲登楼》之王粲形象解析〉，《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4卷，第5期，2008年10月，第91-93页。

荷兰·伊维德，宋耕译：〈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文艺研究》第3期，2001年，第97-106页。

游添灯，韩·权五伦，卢亮廷〈咏剑入鞘——剑的文化传衍〉，《运动文化研究》第33期，2018年9月，页77-99。

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

郑骞：《景午丛编》，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01月。

学位论文

蔡长娣：《唐诗中“剑”的意象研究》，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硕士论文，林保淳教授指导，2021年1月。

陈戈：《唐诗中的剑意象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孟峰年教授指导，2020年6月。

陈可：《唐诗中的刀剑意象》，天津：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聂永华教授指导，2013年3月。

电子资源

美·高彦颐：“铸剑：从干将莫耶故事的流变看儒家伦理的转型”，第十五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香港历史博物馆，2024年11月9日，YouTube 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oBCM71dWLS>（2025年10月浏览）。

元智大学中文系罗凤珠团队建构：“全唐诗检索系统”，<http://cls.hs.yzu.edu.tw/tang/Database/index.html>（2024年6月检索）。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https://ctext.org/zh>（2024年6月检索）。

中央研究院馆藏资源“汉籍电子文献”，“汉籍电子资料库”检索系统，<http://hanji.sinica.edu.tw/index.html?>（2024年6月检索）。